

蕭軍批判



劉芝明 著
示誠書局 發行

蕭 軍 批 判

• 關於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的批判 •

劉芝明 著 知識書店 印行

判 批 · 軍 蕭

著 者

劉 芝 明

出 版 者

北 平 永 安 路

大 津 (1) 遼 北 路

特 經 銷 處

中 外 出 版 社

北 平 西 長 安 街

益 智 書 店

南 山 永 安 路

· 有 · 所 · 確 · 版 ·

版 初 月 三 年 九 四 九 一

(T9) 1-4090

「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是嚴重的
原則性的；其思想本質是墮落的，
腐蝕的，反動的。」

去年九、十月間，在哈爾濱等地，由生活報而展開的，文藝界，青年學生，對於蕭軍及其文化報的鬭爭，我認為基本上是正確與必要的，而蕭軍及其文化報所持的立場、觀點、方法是基本上錯誤的，至於文化報在某些羣衆中所起的作用，則是具有嚴重危險性與毒害的。這個鬭爭，不是如蕭軍所說的是「假公濟私」，是「路倒蕭軍」，是「焚毀自己所不高興的人和物，妄想一統天下稱霸稱尊」，而是一個十分嚴肅的原則性的鬭爭。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的錯誤是思想上的錯誤，是原則上的錯誤，這種錯誤不管蕭軍有意與否，但按其實質則是墮落的，腐蝕的，反動的；是嚴重的違反了人民和無產階級的利益，違反了他所承諸於黨以及黨希冀於他教育羣衆的任務，違反了作爲一個通常革命作家應有的品質和應盡的職責。

蕭軍在文化報上所教導於羣衆的不是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不是魯迅的思想與精神，甚而連小資產階級的進步的民主的思想水平都未達到（這種小資產階級的進步的民主的思

想，我們是歡迎的，合作的，但應與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加以區別，不能混爲一談。）他是打着「馬列主義」和「魯迅」的幌子，偷運反動思想的雜拌，散佈於人民有害的毒素，希求達到他的個人主義的滿足。

我們只要翻閱一下文化報（到目前爲止已出六十五期，五日刊，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四日創刊），便到處可以看到其中有許多對人民、對解放區、對共產黨的不滿、誹謗、侮辱、毒害、和諷刺，例如在第八期上有一篇極惡毒的諷刺文——「新年獻辭」，編者按爲「該稿因其文體腐臭，本擬不登，惟察其內容，尙間有可取者，祇好忍痛刊出，聊備一格，此後擬不爲例。」全篇獻詞共七項，如：「支援前線也！擁護民主政府也！擁護中國共產黨也！打倒蔣介石趕走美帝國主義也！建立新人生觀也！」等等。這些題目是很堂皇的，至於內容，倒不是如編者所講的是「忍痛刊出」，而是「有可取者」（！）這就是作者譏謗土地改革爲：「此真亘古所未有之強盜行爲，真李自成、張獻忠之不若也！滿清雖異族，日本雖異類，尙不爲此，胡共產黨竟如此不仁其甚也哉？」這就是作者在「贅語」（應改爲「聲討」——引者註）中給「黨、政、軍、民」扣上一百二十四個主義的帽子，茲略舉如下：

「……『阿Q』式『瞞不起』主義，『吉訶德』式與風車作戰主義，吹毛求疵主義，馬馬虎虎主義，游手好閒『二流子』主義，『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主義，『群居終日，言不及義』主義，『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主義，諱疾言醫面子主義，言行脫節主義，『吊而郎

當「主義，檢查工作發癲子主義，「王八拉車沒後勁」主義，慢性自殺與自暴自棄主義，只講權利不講義務主義，享樂主義，疲憊主義，虎人主義，真空子主義，拍馬主義，欺上瞞下主義，詔上驕下主義，經驗主義，自然主義，自流主義，空想做夢主義，正統主義，不學無術主義，報功掩過主義，不澈底主義，怨天尤人主義，發牢騷主義，無計算的「大發酒油滿地檢芝麻」主義，「不時不燒香急時抱佛脚」主義，唯利是圖主義，「牆頭草隨風倒」主義，陰陽臉兩面派主義，空談主義，拜洋主義，奴隸奴才主義，不誠懇的「手腕」主義，吃裏扒外主義，……」

作者蕭軍認為舉出這些（實際上是造謠）乃是「君子愛人以德」（！）請讀者看看吧！這就是作為朋友的蕭軍，在新年，抬着棺材，穿着死人衣，給人民和共產黨所獻的「祝辭」！這是多麼惡毒的中傷啊！這是多麼使人憤激而難以容忍啊！

蕭軍避開了人民的光輝、生長、喜悅和健旺……他專心搜索太陽中的黑點，而且是造謠，無中生有，加以擴大、醜化。他把解放區的人民，描寫成爲欺詐、偷竊、下流、機械、無知……例如他以「偷花者」（文化報四九期夏夜抄）「這點小事」爲題，「測驗出一種國民道德的水準以及那種可怕的損人不利己的人心。」他描寫解放區的工農階級爲偷竊、下流。

蕭軍在文化報上所發表的還有更甚的，他仇視共產黨和無產階級的領導，他把共產黨和

無產階級的領導比做「丑角當權」，他認為共產黨裏「真正的丑角是穿上戲袍，善良的人反却充了丑角，共產黨儘讓那些「丑角當權」，使有血有肉的人，都成了被談談笑笑隨便凌辱的屍什，台下的人都看得大拍其手，可是觀眾的目線逃避現實，神經的目趨堅硬，並不是無稽之談了。」（五一期丑角雜談）

蕭軍說在這些「丑角」的統治下，「祇求機械的統一，結果，人民的積極性的人格，人民的積極性的創造精神都被蔑視了，甚而被殺死了。」（四五期政教泛談）。

這就是蕭軍反對以共產黨無產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的統治。

這是够多麼刻毒的啊！這已經不是朋友的諍言，而是毒箭射擊了。

蕭軍的思想發展到最近，是更加墮落了，更加腐臭了，而且走到反動的地步了。這就是他在文化報五三期上所發表的「各色帝國主義」的理論，及「來而不往非禮也」的反蘇濫調，以及他的「撫今追昔錄」中的「其豆相煎」的反對革命戰爭言論。往後的幾期，他的反蘇、反對革命戰爭的情緒和思想是繼續的發展着（這在下邊還要批評到）。

蕭軍的思想是瀕臨於危險的境地上。

二 蕭軍思想錯誤的歷史原因和社會原因。蕭軍思想是一種沒落的社會現象的反映。

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的嚴重錯誤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蕭軍思想發展的歷史原因，同時又有其當前的社會原因；蕭軍錯誤乃是一種沒落的社會現象的反映。

蕭軍作爲一個作家的生活是開始於「跋涉」這本小集子上，這本小集子是些短篇的東西，大半是在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三年的一年間寫的。

這些短篇主要的還是自我表現的東西，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東西，但是「窮逼得他們實在太不情面了，」（「跋涉——桃色的線」）他們拚命的和環境奮鬥，他們只是咬緊牙關，硬着心腸，肉搏般的同窮困來抗戰」（同上），於是他選擇了「文筆生涯」，這是當時一種對現狀不滿，再加上喜好文藝，並能寫寫的知識分子所能夠走的一條道路，這條路有着進步的因素。

由於他窮，就靠自己的力量（其實也是社會力量推動的，不過，蕭軍沒有意識到）寫文章過活，因此，就更多的看重了自己是一切，雖然有時候也關心到「下等人」（「跋涉」中

的一篇短篇，一九三三，八，一一），也曾經恨過那「粗圓白柱的樓房」，「是什麼殿堂，是什麼王的宮」，「是上等人宴會的地方，是上等人吸着，吃着下等人血和汗，肉和骨的地方啊！……」（同上）但這些都是由於自己也是窮的，不是由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而來的。作爲知識分子如蕭軍這樣的人，在當時對於「下等人」，還不是他的作品的主人公，只是配角。

這時期，蕭軍的作品，主要有兩個方面的主題，一面是窮困，一面是愛情。

至於人生究竟「走向那裏呢」？

蕭軍只有這樣回答：「左不是在地球上滾吧！滾到那裏算那裏！地球子如果不許我們滾時，有機會，我們也可以到另個星體上去白相白相。」（桃色的線）

這時期，蕭軍還沒有明確的人生觀，還只是幼稚的本能的作爲個人而出現在世上，沒有真正的深刻的看到人民，看到階級；至於敵人，不管是階級的，是民族的，都還是模糊的，其而是不關心的，只有當着敵人刺到他自己的頭上才抗拒一下，但也並不堅定。這點，在蕭軍往後發展，也是如此。但窮困與文筆生活，總算是推動他走向進步的一個因素。

「八月的鄉村」是蕭軍創作生活的新的階段，水平是超出「跋涉」，這部作品是反映了當時東北群眾的抗日要求與情緒的，他所要反對的敵人是明確的，這比「跋涉」和以後的作品都表現得明確。文字是粗野，新鮮，生動，有力……，從已經走過抗日戰爭時代，再去回

憶那段艱苦奮鬥、曲折奔波的歷史，使人感到「八月的鄉村」確還有些現實主義的表現。這就是「八月的鄉村」中的抗日游擊隊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在艱苦地奮鬥着，預感到曲折、辛苦，要走較長的道路，但最後，革命勝利是「一定的」（「八月的鄉村」，第十頁）。這個是由作者假書中的黨明的嘴說出的，作者之所以能够有此見地，正是偉大政黨——共產黨給他的智慧。這個智慧就是力量，支持了那些年代的艱苦的抗日鬥爭。

但是作者黨軍並沒有真實的理解這個，他在書中表現的是抗日狂熱多於這個理性所支持的力量，因之，讀者從「八月的鄉村」裏只能得到一些抗日印象，同轟轟烈烈的感覺，而不能由於這個作品，喚起真實的有前途的戰鬥下去的精神。「八月的鄉村」作者沒有真正懂得「中國人民是不能被奴役到底而要戰勝敵人」的，因之歷史是勝利的（抗日是勝利的）。但「八月的鄉村」是悲劇的結束了（雖然作者是在結尾上還寫到：「……到帽兒山等我們去吧！……就是這樣準備明天的吧！」（同上，二二六頁）

為什麼給我們這樣的印象呢？這就是說這本書沒有告訴我們抗日的真實力量的所在，也就是這本書的最大弱點和矛盾，就是說這本書客觀上雖反映着廣大群眾的抗日要求與情緒，但主觀上却是把它寫成一支在空漠的曠野上，游魂似的行走的孤單隊伍，人們看到他們，雖不「驚慌」，但似乎也並不「熟悉」而「親熱」（同上，一九九頁），等到這支隊伍進了「集場子」，商家的代表、農民的代表、學生的代表、什麼的什麼……還像迎接胡子似的迎接

了抗日隊伍。

我們很可以理解，在任何一個運動初期，可能是先由一點或某一較先進的一點起來，但這一突出的一點在要求與情緒上是一定與廣大羣衆聯系的，但這個並未爲我們作者所理解；或者這個點是由於某些主觀上原因而脫離了羣衆，但也未爲我們作者所理解。使得這本書未能在這一點上分析現實，批判現實；這是由於作者在當時並未十分清楚的了解抗日鬭爭的基
本力量是什麼，因此才這樣把抗日鬭爭極力渲染爲個人英雄主義的事業，爲「世界弱小民族爭自由，爭平等的好漢子，這是露臉的啊！」（同上「四九頁」）「將來把日本鬼子趕跑了，哼！人也不算白活一回！」（同上「二〇四頁」）「人橫豎還不是一輩子，男子漢，大丈夫，總得闖闖，儘死一輩子在莊稼地裏，有什麼出息！」（同上「二〇四頁」）

正是因爲作者以個人英雄主義事業來理解抗日鬭爭，他必然會看不到羣衆，必然要脫離羣衆，而且羣衆也就對於這支隊伍覺得是自己以外的東西了。

因此，蕭軍在「八月的鄉村」裏當着他描寫抗日情緒時是激動的、熱情的，但是一接觸到階級問題時，則就顯得軟弱無力了，就要暴露出他的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和人道主義了。例如當着地主王三東家用武裝抗拒（抗拒原因姑不論它）抗日游擊隊時，陳柱司令逮捕了他以後，要執行槍決，命令蕭明執刑時，蕭明遲疑疑的說：「槍斃他們必要嗎？」等到地主死後，蕭明則又感到一種矛盾的輕鬆說道：「這是對的！」（同上「一三八頁」）。蕭明這

時也並不是從政策上考慮這個問題，只是從人道主義去感染，然而作者蕭軍倒沒有明確的批判。其他如作者處理蕭明與安娜的戀愛問題上（同上一七七頁），是很不合理的，是完全從小資產階級的觀點設想的，由於處理這個問題而引起以後的一些問題，作者反認為是寫知識分子的情緒波動。當然，作為一個革命的知識分子不應因為戀愛而失去鬥爭意志，但是，作者本想寫知識分子在革命中的動搖，而恰恰是自己以小資產階級的觀點去處理這件故事的，這是一個「小資產階級革命情緒」的反映啊！

由此可見，這小書是小資產階級性的作品，而不是無產階級性的作品。

蕭軍在「八月的鄉村」裏所反映的民族抗日要求與情緒，是有其現實基礎同廣大的群眾基礎的，但作者是從小資產階級的觀點、情感、立場描寫的。抗日不管任何曲折艱苦，但因為抗日是以工農群眾為基礎的，所以他一定會勝利的。然而作者以小資產階級的面貌把他抹了一下，就在「八月的鄉村」的形式下把它抹了一下，好像是無力量的，無前途的。這個不是歷史的往前發展的真實，而是作者的小資產階級性的無前途的表現。其次，抗日戰爭勝利的歷史是廣大群眾的集體的英雄主義的事業，表現在無產階級及其領袖共產黨所領導的英雄的模範的事業上，這裏就不能是個個人主義的英雄事業，像是「八月的鄉村」所說教的「男子漢，大丈夫，所闖出來的」事業。

「八月的鄉村」中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是被作者生硬的割裂開的，階級鬥爭的政策是概

念的擺在書裏的，而且有許多地方帶有小資產階級「左傾」盲動的政治色彩；在革命領導上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才脫離了廣大的群眾。這個在當時作者也是不能理解的。不過，可以由此得到一個作爲作家應當如何反映現實的要求，就是作爲一個革命作家要深深體驗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的馬列主義原則和政策，並有血有肉的與自己的階級觀點、方法、立場聯結起來，去觀察社會、階級、歷史……這樣，才能寫出偉大的作品。

蕭軍在「八月的鄉村」中不能掌握到無產階級觀點、方法、立場，因此他的民族思想就表現了狹隘性，就帶上小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的色彩，這就是「八月的鄉村」的思想的分析。

「八月的鄉村」包含着兩種因素，一種是積極的，但還不是無產階級的，只是小資產階級的進步思想和抗日的民族思想；而另一種則是消極的個人主義的英雄主義。積極的因素在當時是突出的。

從蕭軍到目前爲止的整個歷史，「八月的鄉村」是個青年時代，而且是個頂點，但我們不希望這將是蕭軍一生中的最後的頂點。

往後，那積極的因素就逐漸的降低下去，消極的因素則上昇。

「羊」和「江上」就是向消極方向走了。

蕭軍於一九三五年到上海，這時期的作品有「羊」和「江上」兩個集子。

從「羊」和「江上」來看，蕭軍的創作生活是由頂點往下降了。讀「羊」和「江上」，

使人感到既沒有如「跋涉」的稚氣可愛，年青人的自我鬭爭，更沒有「八月的鄉村」那種硬勁，歌唱着民族的反抗。但就文字來說，則比以前精練了，雕琢了，也顯得整齊多了，但那生動、粗野、健壯的感染力則是消失了。這個轉變是不祥的！

爲什麼「八月的鄉村」裏的積極精神就這樣飛快的消失了呢？爲什麼不把它鞏固起來而繼續發展下去呢？抗日並未完結，而且抗日戰爭時代還未開始，而且人們是怒在心裏，而且一二九運動也就是正在這一年（一九三五年）。

我們在「羊」裏，找不到那個時代的人們的憤怒和不能抗日的苦悶。作者已經是離開了群眾的當時主要的課題，搜索一些應景的玩意、瑣事，雖然題材也像當時文壇上或更遠一些時的文壇上（如三二、三三年）寫些「下等人」怎樣受窮受壓，但那些都寫得無血無肉的，沒有憎沒有恨，沒有感情，更沒有組織起來反抗的力量，也只是以窮人去點綴點綴文學罷了。當然，真正的戰鬭文學和戰士還存在，還在激烈的戰鬭着。

魯迅就是當時戰鬭的主將。

魯迅當時就看到了這點，他就起來反對，不能把左翼文學（反對某些投機「文學家」）當做點綴，反對把左翼文學庸俗化。由於那個時代敵人的壓迫手段更加殘酷，魯迅就轉變了鬭爭方式，以雜文這個武器來進行更尖銳的鬭爭了。

當然，以小說爲形式的文學也還是能存在的，「八月的鄉村」能够出版，也說明雖在「

抗日殺頭的時代，也還是能够戰勝的，而且說明群眾是需要它。

但「羊」以及「江上」的氣味顯然與這個時代不相稱的出現了，缺乏戰鬥性了。

作者住在上海的心情，正是如「羊」裏的主人公，被關在牢裏像羊似的。

上海是個囚牢，人們是不自由的，作者蕭軍的心情，在「羊」裏的表現並沒有給這個不自由以反抗，倒有些「心平氣和」了。「每天看到海，看到燕子，只是頭髮脫落了」，沒有絲毫的不能忍耐和憤怒的情緒，這是與那個時代的關在囚牢裏的政治犯不相似的。而且這位主人公，所關心於犯人的是他的怎樣偷竊東西，而不是從他們嘴裏探聽群眾怎樣在行動，革命的同志怎樣在奮鬥……這些正是作爲一個政治犯人，當着他接待一位新的犯人來時，所必要想法子打聽的，而且好像是抓到一件寶貝似的在挖掘。

但這些，作者是不關心的。這也就說明作者到了上海以後，是與政治脫離了，是與廣大群眾脫離了；因之群眾的生活、要求、情感就沒法子到作者筆下。

「江上」這是蕭軍回憶故鄉（東北）而寫出的東西，但那已不是「八月的鄉村」的英雄們的憤怒、復仇、反抗的呼喊，而是個無力的呻吟了。

這是悠閒的描述着一些瑣事，如：小孩、餃子……撿煤渣……蕭軍常常的複述着這些瑣事，這就說明他的生活已經在枯竭了。

蕭軍創作生活由「八月的鄉村」下降到「羊」和「江上」的水平，應是一個後退，而不

是一個前進。這對於蕭軍說來，如果說「八月的鄉村」是他與群眾的一個結合，而「羊」與「江上」則是他與群眾的一個脫節；如果說「八月的鄉村」時的蕭軍還在時代的前邊，也許走得稍遠一些，那末，在「羊」與「江上」時的蕭軍則是掉了隊，站在旁觀的地位上，寄與「下等人」一些同情罷了。

這思想，是有着他的掉隊的原因的。這是因為蕭軍的抗日情緒極其不鞏固，只是熱情沸騰，沒有理性作爲基礎；而且他是以個人主義的資格參加的，這當然就不能支持好久。

到了上海，蕭軍是以「作家身份」出現在文壇上了，他所關心的是他自己，而不是人民大眾。當時人民要求歌唱，要求粗野、健壯、戰鬥，但蕭軍是悄然無聲了，他的創作生活和文學表現是走向消沉的方面去了。

作者蕭軍在「江上」的序上這樣寫道：

「我想使人最難堪的，莫過於在自己的作品裏，被別人明顯的看出或指出是受了某某人某某書的影響，雖然這影響是好的，是起始寫作的人所不能逃避的，——可是在我個人總是感覺着遭受了一種侮辱，所以在每次無論是想到一個題目，一個故事，一個人物的表現方法，或甚至一個字句，如果知道了某某人，或某某書中曾經用過了，總是像躲避一條美麗的蛇似的躲避着，……」

這是由於作者戰鬥生活的缺乏，而表現的文思枯竭。

作者曾經問自己：「爲什麼我不能發現更新的呢？」

這個，作者是有沒有回答的。依我看來，是你脫離了群眾，脫離了時代，你應該繼續歌頌抗日鬥爭，但你把它折斷了，你的生活把它折斷了。

這就使得作者自己也在疑問：「我總不相信自己的文章會有幾個讀者的。」

是的，你的讀者是日漸稀少了。

一九三五年抗日浪潮（一二九運動）是含過蕭軍而捲過去了。

從此蕭軍便留在後頭了。

偉大的激烈的抗日戰爭時代，蕭軍是正如「八月的鄉村」的蕭明一樣，是被沖洗到後頭並擱淺了。

偉大的激烈的抗日戰爭湧現出幾千百萬的英雄，「八月的鄉村」是真的比也比不上了。

作家蕭軍，在這樣激蕩的戰爭中沖得東走西走，他的行動跟不上激動的時代，他抱着「八月的鄉村」睡起來，夢見「第三代」的祖先們去了！

這又是個後退，整個一個抗戰時代，蕭軍是沒寫出一些什麼的。（聽說曾寫了一個「側面」，很壞，沒有讀到。）

蕭軍背上了包袱走進延安，是被壓得重重的。

蕭軍在延安的幾年中，在思想上發展了「八月的鄉村」中消極的因素，極端自私的個人

左。